



山西抗战纪事

三卷

杨茂林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山西抗战纪事

三卷

杨茂林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抗战纪事/杨茂林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604-5

I.①山… II.①杨… III.①抗日战争—史料—
山西 IV.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340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山西抗战纪事

杨茂林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604-5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63

定价:168.00 元

目录

第六篇

笔做武器投向侵略者

抗战文学奏响了时代最强音

一、榴花初开，晋人拓荒	639
二、追悼鲁迅，春在何方	644
三、西北战地服务团来了	653
四、第二战区的抗战文学刊物	660
五、作家们的随军战事记录	665
六、来自重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	678
七、来到民族革命大学的作家们	681
八、产生在日军大“扫荡”中的文学作品	686
九、本土作家笔下的第二战区	690
十、太行诗社集聚起的诗人群体	694
十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入山西	701
十二、人民作家赵树理	704
十三、《吕梁英雄传》的创作和问世	714
十四、晋绥新文学作家群	718
十五、抗日将领在山西的抗战诗篇	726

十六、抗战文艺全面开花	733
十七、“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	747
参考文献	750

第七篇

在战争风雨中克难办学

抗战教育铸就了民族自强的信念

一、民国教育模范省——山西	755
二、日本侵略者对教育资源的毁灭性破坏	759
三、敌后根据地重建、巩固和发展初等教育	762
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干部学校	782
五、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	795
六、第二战区普及义务教育	800
七、晋西南抗战时期的中等教育	805
八、山西大学南迁克难、坚持办学	819
九、民族革命大学的兴衰	826
十、紧切抗战主旋律的社会教育	834
十一、伪教育行政机构实施的奴化教育	837
十二、披着“新民”外衣的奴化学校	843
十三、日伪以奴化教育为核心推行的社会教育	849
十四、培养高级亲日分子的留日教育	854
十五、“里红外白”的汾南抗日学校	857

十六、形式多样的反奴化教育斗争	860
参考文献	866

第八篇

资源在疯狂掠夺中惨遭破坏

区域生态平衡遭遇了空前浩劫

一、“囚笼政策”与晋东北的“无人区”	873
二、“棉花增产运动”	882
三、日本在山西强迫种植罂粟	891
四、日军“四三木厂”与森林资源掠夺	898
五、日军华北开发公司的掠夺计划	903
六、日军以“国防资源的有效获得”为借口的掠夺性开发	912
七、“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	919
八、日军不择手段地抢夺盐业资源	927
九、惨绝人寰的生物战	930
十、令人发指的化学战	941
参考文献	958

后 记	962
-----------	-----

第六篇

笔做武器投向侵略者
抗战文学奏响了时代最强音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抗日救亡作为山西新文学的主题内容进一步突出。此后，随着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山西的革命文学团体和作家进一步走到了抗战文化的前沿，领导和组织了气势磅礴的抗日文化运动，成为抗战时期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来自全国的文化组织和优秀作家以笔作为犀利武器，用报告文学、小说、诗词歌曲、街头诗剧等形式，直面对敌斗争的残酷现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歌颂山西人民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既有快速反应式的鼓动宣传，又有深入挖掘上的刻画描写。丁玲、周立波、萧红、萧军等一批抗战文艺工作者与一大批优秀抗战文学作品应运而生。

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山西敌后根据地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批优秀作品。以此为契机，一个以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和胡正为代表的文学新人团体迅速成长，代表作就是《吕梁英雄传》。山西抗战文学由此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在专业作家的推动和帮助下，山西群众性抗战文学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来到山西的全国著名作家和文学团体，与山西本土作家一道用自己的创作精神和文学成果，推动山西抗战文学走上了一条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这在山西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山西抗战文学是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建立民主政权、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画卷，它以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和道路，处处体现了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不仅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榴花初开，晋人拓荒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以武力攻击东北，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很快，日军便占领了沈阳全城，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沦陷，白山黑水间的锦绣家园在日寇的铁骑下沉沦，大批东北人民悲怆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背井离乡。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和反抗。如果说这之前的山西，在阎锡山政府的统治下还属于黎明前的黑暗，那么，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山西，则呈现出一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形势。9月21日，太原各校学生及各界人士开展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9月24日又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12月，太原学生在学生联合会组织下发起抗日请愿活动。然而，就在这次活动中，请愿学生遭到国民党省党部义勇队镇压，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中弹身亡。惨案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怒，一时间，太原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最终迫使当局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高潮。

抗日救亡运动催生了抗战文学的大量出现，新文学在山西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太原是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和出版抗日刊物最早的地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师范学校学生霍九荣、杜德（杜润生）等就成立了九一八读书会；1932年，共产党员张衡宇、李舜琴、杜心源等教师组织成立了太原教职员联合会，共产党员杜连秀负责成

立了太原社会科学家联合会，李延年（共产党员）、赵石宾、高沐鸿等成立了太原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田际华、赵宗复等成立了榴花社，张柏枫（李雪峰）、高耀夫等秘密成立红军之友社；1934年，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周北峰利用阎锡山标榜“学术自由、真理战胜”的有利时机，联络邢西萍（徐冰）、张友渔、侯外庐、温健公等成立了中外语文学会。这些群众救亡团体和党的外围组织创办了《亚野风》《子夜》《秋天》《榴花》《中外论坛》《文艺舞台》等文学刊物，大量宣传抗日主张、传播进步思想、抨击社会黑暗。《中外论坛》翻译转载了《共产国际通讯》和苏英德法日等国共产党、工人党发表的理论专著，出版后不仅在山西发行，还派专人向北平、西安等地分发，仅上海一地每期发售五百余册。

在这些文学刊物中，榴花社及其主办的《山西日报》副刊《榴花》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榴花社是20世纪30年代于山西成立的一个小型文学团体，由山西青年学生田际华（又名唐河）、吴宪千、赵键、赵继昌等人发起。赵继昌后来出版有《赵继昌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榴花社成立的始末：1933年，赵继昌在北平四中高一一年级读书，当时，日军为了胁迫国民政府签订妥协条约，由军方派几架战斗飞机俯冲中南海。书中写道：“飞机由北向南飞，经过我校上空，当时我们正在上课，老师和学生都心惊胆战。飞机扰乱了好几天。”“6月初，日军向崇文门开枪，日本浪人在广渠门、通县一带滋事捣乱。北平城危在旦夕。在此情况下，在北平各学校读书的外地学生纷纷离校返乡，以观变化。四中山西的同学多数已离校，我也决定回家，偕同高二同学田际华回到太原，又回到五台。”在五台，赵继昌联络在混乱局势之下同样回到县里、在京津上学的青年学生赵仲池、赵守封等人，在东冶地区展开了初期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为了更广泛地接近群众，他们仿效巴黎公社原则，吸收进步青年徐八、霍满银、张尚智等组织了民众反帝大同盟和六月公社，并编写了组织大纲和宣传大纲。他们还与共产党员赵子云等

保持密切联系，开展革命活动，传阅党的刊物《北平青年》《红旗》等杂志。同时，他们在东冶、五级、槐荫村等地举办了暑期补习班，作为团结革命力量、进行宣传工作的基地。

在太原，赵继昌和田际华回到太原后，几人暂住在赵键家，在和赵键、田际华、吴宪千三位同学商议后，他们决定利用《山西日报》办一个宣传进步思想的副刊。1933年6月，几位年轻人凭着热血和勇气，利用赵键的关系，和《山西日报》交涉，取朱熹诗“五月榴花照眼明”一句之意，创办了副刊《榴花》，表达了让榴花红遍中华的愿望。

第一期出版之后，唐河便将刊物寄给了鲁迅先生。6月20日当天，鲁迅去万国殡仪馆送别遭到暗杀的杨杏佛，结合杨杏佛先生的遭遇以及自己面临的恐怖环境，给榴花艺社诸君回复道：“十一日信及《榴花》第一期，今天都已收到。征求木刻，恐怕很难，因为木版邮寄，麻烦得很。而且此地盛行白色恐怖，仅仅主张保障民权之杨杏佛先生，且于前日遭了暗杀，闻在计划杀害者尚有十余人。我也不能公然走路，所以和别人极难会面，商量一切。但如作有小品文，则当寄上。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查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鲁迅是在当天收到信就回复的，肯定了新文艺在太原的“开垦”工作，并告诫田际华“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信中的鲁迅凛然、冷静、讲求斗争艺术，谆谆告诫中涌动着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以及对新文艺如何生存发展的关切。

在鲁迅先生的关心下，《榴花》共出了七期，赵继昌在五台老家举办革命活动时，曾去母校川至中学看望老师，当他看到新建的两个月衙门上一边刻着“新技术”，一边刻着“旧道德”时，对后者非常反感，于是写了《新技术与旧道德》一文，抨击这种新技术和旧道德同提的

不合理现象。他认为：新技术固然应该提倡，但旧道德却不应提倡，特别是道德有其阶级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的道德，都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这种旧道德尤其不应当提倡。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川至中学的校长看到此文很生气，甚至拿着报纸去找住在老家的阎锡山的父亲告状，这件事之后，《榴花》很快就被太原反动当局禁止了。

在这之后，抗战局面虽然越来越复杂，但是，榴花社的成立和《榴花》杂志的创刊，就像一把火红的焰火点燃了山西人民的希望，从此，这朵盛开的石榴花，以其他各种形式姿态，在三晋大地上继续盛放。

1935年华北事变后，太原和山西实际上已处于抗战的第一线，土皇帝阎锡山最终也不得不选择守土抗战、联共抗日的道路。继北平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振聋发聩的口号之后，在红军东征、绥远抗战、牺盟会成立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下，太原很快成为抗日文化传播最广泛的地区之一，抗战文学也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太原青年为宣传抗日创办了《新文字报》《学生运动》《为民族解放》等报刊，宣传抗日主张，要求当局支持北平学生运动。在红军东征后，田景福组织了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亚马、卢梦等成立了太原青年文学工作音乐会，关芷萍、史纪言等打出了太原拓荒社、最后生路社等文学社团的旗帜，《山西党讯》副刊和《太原日报》副刊都开始发表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在绥远抗战期间，太原文化教育界组团赶赴前线演出独幕话剧《塞外的狂涛》劳军慰问，西北影业公司组织战地摄影队奔赴前线拍摄了山西早期的电影纪录片《绥远前线》。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后，出版了旗帜鲜明的抗日刊物《牺牲救国报》，编印了抗战大鼓词《亡国后的东北》和《村政协理》；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出版了《政治周刊》；牺盟会太原市委创办了《大众园地》；牺盟会领导的抗日救亡先锋队还创办了《抗战生活》。1937年元宵节，牺盟会组织了三天救亡歌咏大游行，继

而又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红五月”宣传活动，太原的舞台、公园、广场、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演唱《放下你的鞭子》《新莲花落》《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戏剧和歌曲。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塞上行·太原印象》中曾记述道：“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跷、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样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吸引着东北、河北、河南以及平、津、沪等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进步青年奔向太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就这样，山西的抗战文学在经历了榴花初开、积极拓荒阶段之后，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二、追悼鲁迅，春在何方

宋之的是我国著名戏剧家。1933年，由于白色恐怖加剧，为躲避国民党宪兵搜捕，宋之的被迫中断学业离京赴沪，参加上海左翼剧联，组织并领导新地剧社、大地剧社，同时参加了夏衍领导的左翼影评小组，在《民报》副刊《影谭》上撰写影评，从此开始了职业文学活动。1935年4月，宋之的应旧友张季纯之邀，北上山西太原，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创作了话剧《罪犯》、电影剧本《无限生涯》，并与著名电影导演王苹结为终身伴侣。过了一年，由于阎锡山开始在山西公开迫害进步人士，宋之的返回上海。就在这一年的9月，宋之的在茅盾主编的《中流》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在文坛引起了极大反响，被誉为我国早期的报告文学佳作。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从开端到结束都围绕着“春”意的叙写伸展开来，虽然春天已临，可是春意却被无情地关在城外，在太原城里仍然寒冬凛凛、草木皆兵。作者以辛辣的讽刺笔调，揭示了山西太原反动统治者残酷、愚昧的统治，以及老百姓们在恐怖气氛笼罩下，朝不保夕的凄惨生活；同时以厨子为描写对象，暴露了一部分群众的麻木和奴性。

作品以第一人称“我”的见闻为线索，采用新闻剪辑的手法，结合厨子的行踪，在城内各个角落做了巡视。作品选取的素材，都是一些零星琐事：灰墙、灰土、灰衣裳的兵，枪声和喊“口令”声，“好人证”的分类、佩戴要则，哼着淫调的厨子，为领“通行证”而去照相馆排长队的人们，还有“新闻剪辑”、杀人谣言、奖励告发的条例等等。从

“我”的言行中表现出对他们的爱憎，尤其在最后喊出“我是多么的怀念春啊”的呼声，更是发人深省。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震惊了阎锡山统治的太原市。

作者自谓这篇作品是“报告文学的尝试作”（见宋之的《控诉·后记》），实际上，“它同《包身工》一样，克服了过去报告文学只偏重报告事实而不注意艺术加工的缺点，标志着我国年轻的报告文学的显著进步”（见唐强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篇作品在正式发表前，曾得到看过手稿的友人的高度评价并热心推荐给茅盾，茅盾读后大为称赞，又推荐给鲁迅先生。当时正在病中的鲁迅先生卧床读完了手稿，称赞它真实描绘了在阎锡山统治下太原这座“死城”的社会面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茅盾将这篇作品在《中流》上发表出来并亲自写了评论文章。文学巨匠们的首肯，广大读者的好评，几十年来的传诵，都充分表明《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一篇针砭时弊、抨击劣政、独树一帜、经久不衰的佳作。

宋之的在这篇文章中描绘的太原城，正是当时山西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就在这种形势下，太原的文学青年们很快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活动，这场活动，似惊雷，也似闪电，给阎锡山统治下黑暗的太原城，乃至山西省，撕开了一条大裂缝，在这条裂缝背后，新的革命曙光正在不断闪现，终成覆盖一切的光明！

在给出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意见后不久，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学巨匠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商量，立即组织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曹靖华、许季弗、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人组成。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如下：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

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各界闻耗，唁电唁函纷纷不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了三份电报。一份发给鲁迅家属，另一份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还有一份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虽然此时阎锡山的白色恐怖还笼罩着太原，但是，为了唤起群众、团结群众，推进太原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下，太原的进步文艺青年田景福、卢梦、亚马、樊希骞、杨蕉圃、赵秋心和学者杜任之等，很快便发起了“太原市文学青年追悼鲁迅大会”。10月21日，他们在《山西党讯》上刊登了“追悼鲁迅先生逝世专刊征稿启事”，之后，《山西党讯》的副刊《最后一页》连续11天，出刊7期《追悼鲁迅先生逝世专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成为全国之冠。10月25日，太原举行了有七百余人参加的追悼鲁迅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艺术学院副院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秘书、中国作家协会长春分会主席的山西平定人亚马，曾特意撰稿，回忆这段辉煌的历史（以下亚马回忆部分改写自《山西文史资料》第36辑）：

1936年夏，亚马去找太原的《山西党讯》副刊《最后一页》的编辑杨蕉圃，他是该刊经常投稿人之一，和杨蕉圃也是朋友，由于这种关系，不时就到该报编辑部所在地东缉虎营的原省参议会（曾为国民党党部占用过）大厦去走动，或帮选稿，或为介绍稿件，有时间就画大样，也或做最后校样的事。去得多了，出入都方便，编辑部的人也不在意。10月19日晚上，他路经东缉虎营的时候，又进编辑部了，结果，正好遇到收抄电讯的人从另一间房子过来讲：鲁迅逝世！

亚马在编辑部就想：消息是真的吗？前些时说病重，后来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大文章，这正是民族解放斗争高潮到来的时候啊！真的这一代文豪要陨落，该是如何的痛心啊！

待杨蕉圃完结他手头工作后，两个人又说起自己的心情。亚马和杨蕉圃交换了意见，两人一致认为国民政府是不会对这位伟大人物的逝世有任何表示的，更不会给予荣誉和尊号，可是革命的劳苦大众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示追悼情谊的行动，也认为，各地不可能有统一规格。所以，他们应该从具体情况来想问题、做事情，做对鲁迅逝世后在政治、思想、感情上能做的事。

两人讨论后，一致认为最好能发动组织一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追悼活动。如能和上海的殡仪活动密切配合就更好，并且围绕着追悼集会，以《最后一页》为中心发动征集追悼稿件，连续出刊专页，争取尽量配合上海的葬仪进程，以表示对鲁迅先生的尊敬。

杨蕉圃一再强调说明，他的倾向性意见是争取组织公开的追悼活动，以表示劳苦大众对当代伟人的怀念心意，并表示《最后一页》是他主持编辑的，他完全愿意承担发起征集稿件的工作，并逐期刊出人们关于鲁迅逝世后的复杂心情的各种文章，如抒发自己的哀悼情绪的，对鲁迅的推崇和评价的，以及表示愿继承教诲的，学好、做好新的文学革命事业的各种形式与体裁的文章。亚马则认为，如能两者做到很好，如不能争取到公开追悼的机会，那么追悼专刊亦按计划照常进行。这是必须估计到的。因为，就报纸说，还有个主办人的态度问题，还须得到他的同意才行。开追悼会的事，还须做许多具体工作，特别是必须得到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才能进行。两人商量完成后，约定各人去找些朋友们商量一下。此时已经是深夜，两人便没有再去找党组织请示。在20日早饭前，亚马便到太原师范去找张进林（太原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汇报此事。